

# 文廷式宗族的兴盛与清末萍乡社会变迁

阳水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文氏宗族于明正德嘉靖年间始迁萍乡, 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完善的宗族组织和优良的家风, 清代成为萍乡的强宗大族, 在萍乡传统社会时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 在清末有力地促进了萍乡社会的近代化变迁。

**关键词:** 文氏宗族; 文廷式; 清末萍乡; 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49 (2014) 02-0032-07

## 一、引言

文廷式所在之宗族为清以来萍乡大族, 作为一个明中后期才迁徙而来的宗族, 在萍乡这一地域中从零开始, 逐渐枝繁叶茂, 成为地方社会中的强宗大族, 且“取巍科登显宦者不乏人”。<sup>[1]</sup>传统社会中科举功名是一个宗族声望与实力的体现, 而萍乡历史上科名的高峰都与文氏相关, 最高为族中文廷式在光绪年间荣登榜眼, 其次为与文氏有姻亲关系的刘凤诰在乾隆年间得中探花。与此同时, 被称之为“蕞尔小邑”的萍乡到了清末却领风气之先, 煤矿开采的现代化和株萍铁路的开通使得萍乡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 越升为当时湘赣两省的工业中心, 甚至有了“小上海”之称。那么文氏宗族兴盛的原因是什么, 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与萍乡社会又发生过怎样的互动?

本文行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即是围绕着上述的问题。本文以文氏宗族的兴盛为主线, 意在厘清文氏宗族的发展历程, 并讨论兴盛的原因, 同时探讨文氏宗族对清末萍乡社会变迁的影响; 主要利用文氏族谱、萍乡地方志等相关资料, 充分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行文的时间范围上至文氏迁萍下至清末。笔者不揣冒昧, 做出一番尝试以期补文廷式研究之不足, 浅陋错讹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二、文廷式宗族的兴盛

厘清文氏宗族兴盛原因与历程的最主要资料为文氏族谱, 在本文考察的时间段里, 文氏宗族共有三套族谱留存后世,<sup>[2]</sup>修谱时间依次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道光元年(1821)和光绪十年(1884)。第一次的修谱情形可以从以下引文获知一二。

“萍邑纵横仅三百里而文氏散居者十余处, 别户分门支派未序谱帙鲜据, 则虽系出一本究何从而考核之耶! 惟城内北隅与湘东下市二分实共一脉, 自十二世蓬山公住固塘树六义堂, 至十九世善端公徙居长沙新糠市, 二传而固勤、固谨复回市田。固勤公子必达乃始迁居萍乡湘东下市, 为湘东城内二处始祖。当其时祠立谱集家声丕振, 殊遭丙丁兵火逃窜流离, 十存其一, 虽赖曾伯祖圣渠公、曾祖又祥公记载于康熙元年, 而略举其耳闻目见, 不无渗漏, 盖其失传也, 非一日矣。华生乾隆丁巳迨成人之秋, 去康熙壬寅又近百年, 虽欲举而明备之俾不如别户分门者之少, 序列依据而前任无传, 亦安得杜撰于数百年之后, 幸辛巳仲冬得庐陵富田本宗悒君携明朝所留老谱出示, 考核累日而后知善端公虽徙居长沙, 固勤公已回市田, 市田虽离固塘仅数里, 则昔人所传余派自固塘

收稿日期: 2014-02-26

作者简介: 阳水根(1990-), 男, 江西萍乡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宗族史。

来信不诬也，然蓬山公、必达公老谱虽列其名，而余派昔人所传之遗简中间数代名，既不同世又不合，虽欲再考加访问而文献不足据加删逸又传记已久，余亦安敢持一己之见以妄加断论。今依老谱定其世系规模，而于中间数代别列其名于前，则既不紊世系而亦不殒其称名，将湘东城内二分其亦庶乎不与别户分门者之支派，未序谱帙鲜据同类也。其缘起以俟能者考证而加祥焉。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仲冬月。”<sup>[1]</sup>

上述材料是由文廷式的曾祖兄弟文华元在第一次修谱前所作，从中可以获知初次修谱是在核对先人笔记的基础上，以永新固塘和吉安富田这两种文氏老谱为主要参考。可以看出文氏修谱认真严谨，不攀附虚构，实事求是，其内容可靠可信。后面的

两次修谱除了必要的内容充实添加之外，基本沿袭一修谱的观点。

文氏宗族的迁江西始祖为文时，<sup>[1]</sup>文时字春元，原为蜀人，文翁<sup>[2]</sup>之后，于后唐同光三年以帐前指使、轻车都尉来镇江西，最后落籍于永新；迁萍乡始祖为文必达，于明朝正德至嘉靖年间来到萍乡湘东下市，具体时间失考；其间，必达祖父善端从商定居长沙新糠市，善端孙固勤（必达父）返回永新固塘；到了崇祯年间必达孙达魁始迁县城北隅，从此分为县城与湘东两支。

那文氏宗族的发展轨迹又是如何呢？从下面所列出的文廷式的直系祖先的详细情况中，我们或许可以大致窥探出其宗族的发展轨迹。

表 1：文廷式直系祖先

世代	名讳	详情
1	时	始迁江西祖，后唐同光三年任帐前指使，镇江西，落籍永新固塘。
2	环	后唐上舍，未仕。
3	光大	宋开宝初国子监上舍，郴州判官，承事郎。
4	世基	宋雍熙年间，仕蜀新都主簿，升桂阳令，迪功郎。
5	原父	歿于咸平间
6	育	国子监十三上舍。
7	纽	庆历初中宏词科，授龙阳宰，后升潭州守，赠通议大夫。
8	恭	授承事郎
9	周	建炎丁未，居京庠，后授江川淮使、江淮处置副使，武义大夫。
10	进	以父恩补将作监簿，淳熙授实录院检校。
11	原	绍定戊子乡举授信州户曹。
12	公行	淳祐江西漕举赋魁，隐居于山水，贲业日盛为乡望族。
13	昭叟	宋景定五年登湖南漕举，授广州录事，迪功郎。
14	天善	读书有才
15	泰翁	理家至富，尝捐金助儒学。
16	器	失考
17	仁厚	失考
18	隐郎	赘永新市田
19	善端	中年从商，立庄长沙市新糠市，治贲产厚生。
20	聪	字本鼎。
21	固勤	自新糠市同两弟俱回新市田
22	必达	迁萍始祖，于明中后期迁徙，落籍归圣乡怀信里三保二图三甲
23	礼国	邑诸生
24	达魁	崇祯年间人，典史，县城一派嫡祖。
25	成德	(1600-1667) 授经历职，始迁县城北隅。
26	嗣发	(1640-失) 字又祥，邑庠生，考授州同。
27	学	(1669-1734) 字汉昭，廩贡生，任信丰训导。
28	集圣	(1715-1772) 字合三，号诚斋，候选州同。
29	守元	(1759-1820) 字定斯，号融谷，附贡生，赠朝议大夫。
30	晟	(1791-1859) 字梧生，号叔来，廩生，惠州府知府。
31	星瑞	(1826-1882) 字树臣，号奎坦，郡庠生，高濂兵备道。
32	廷式	(1856-1904) 字道希，号云阁，顺天乡试第三名举人。

注：数据来源为《文氏宗族三修族谱》

分析上表,迁萍乡之前的世代,除了第十六世和第十七世因处于宋元鼎革之际事迹无从考证,其他的直系祖先来源、身世皆可考。其中大多担任过官职,最高为文周所担任的江淮处置副使,也有从商致富的,泰翁和善端即是如此。整体上看,从第一世至迁萍的第二十一世,这一时期的文氏是官员频出,也偶有商人出现,亦官亦商,宗族势力不可谓不小。迁萍之后的世代总共十一世,时间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到清光绪十年,关于始迁祖文时的记载,并没有迁徙的缘由和具体的徙居时间,其父固勤从长沙回迁永新尚未完全落脚,固勤子必达随即由永新徙居萍乡湘东。从迁萍二世礼国开始发迹,“二世讳礼国……为人谨厚正直,乡族争相推重”,<sup>[6]</sup>后世都相应的获得了学名与一定的官职。由一开始的不入流的典史、经历,到嗣发获得生员的名号实授信丰训导,再到文晟官至惠州府知府,直至到光绪二十年文廷式得中榜眼,其宗族的科名和官级总体呈上升的趋势。

传统社会人们安土重迁,乡土情结重。文必达于正德嘉靖年来萍的缘由在族谱中无从查考,因此只能进行有限的推论。郑锐达根据《昭萍志略:氏族志》中氏族来萍时间进行统计,得出明清时期来到萍乡的氏族占氏族总数的81.3%,其中清朝来萍氏族占53.5%,明朝来萍仅占27.8%,而明中后期来萍氏族只占3.2%,虽然以上数据不够全面,但它基本上反映出萍乡移民的总体趋势。<sup>[7]</sup>由此可知,文氏宗族不是在移民高峰期来到萍乡,而高峰时期的移民大部分是因为天灾人祸如战乱、洪涝灾害等原因而迁徙。同时,考虑到必达父祖都是从商之人,笔者可以大致推断,文氏的来萍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sup>[8]</sup>

在宗族组织建设方面,文氏在修谱的同时,也在新建或重修祠堂。文氏总共有四个祠堂,北堂公祠、达魁公祠、静斋公祠和诚斋公祠。最主要的公祠为北堂公祠和达魁公祠,前者祭祀迁萍始祖必达公,后者祭祀迁县城始祖达魁公,建于乾隆三十五年。它们都设有相应的祠规、祠田和义学,以加强宗族管理。以下为达公祠祠规的摘录。

“每年春秋二祭各房子孙自年逾十五非有事,姑宜整肃衣冠来祠与祭,毋得懒惰,违者责之;

祠内所管各处租谷归祠首管理照时价同菜卖,不得一人私自违价擅菜,非经理祠

事者亦不得向各莊私收租谷,违者共同处罚;

经理祠事者公选贤能以五年一换,倘不愿经营及有故远出者另择能者补,但既承办务宜谨慎以尊祖敬宗为事,祖宗自必默佑,苟稍有侵蚀非但查出责罚,即祖宗亦断不为之阴佑也;

文武入泮给花红钱五挂,补廪同五,贡给钱八挂,中举给钱十挂,中进士给钱十六挂,主事中书给钱二十挂,翰林鼎甲给钱二十挂,此系照现在祠费酌给日后祠费丰足自应随时递增;

子弟当孝亲敬长自爱自重,如有过犯小则训教大则责惩,其不尊家法抗违长上者稟官究治,至于身为下贱流为匪徒多事犯法确有其据者,将其人出族具呈存案,永不准入祠与祭与饮”<sup>[9]</sup>

祠规在关于祖宗的祭祀、祠田的管理和祠首的职责方面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强调对族人的管理,对族人的入学和科举功名也制定了奖励的措施。

经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文氏宗族在萍乡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氏祖先来萍时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基础,“邑湘东之有文氏也,自我基祖尊三公始,公讳必达,尊三其字也。公曾祖讳善端,明永乐间由永新固塘服贾长沙之新糠市,货殖益厚……我基祖由市田迁湘东”,<sup>[10]</sup>迁萍始祖必达公父祖已经通过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来到萍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这一良好的物质基础相当重要,如此才可供后代接受教育,因此来萍第二代礼国公即获得了生员的功名。第二,文氏宗族有很强的凝聚力,如此才能集中力量谋发展,“宗族共同体的凝聚,决定于祖先的名望、世系的清晰、祭祖的实现、聚族而居、族人生活的维持、族长的管理、共同的利益等因素”,<sup>[11]</sup>而这些因素文氏宗族都具备。第三,文氏宗族家风优良、家学渊源深厚,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正如刘凤诰在谱序中提到,“余观夫著族蕃昌子孙鼎盛,必其祖宗有化民成俗者以开之,其继世有寄行瑰节以振之,而其后人能敦行好礼以培之,于是乎本固枝荣,遂以绵世泽于勿替”。<sup>[12]</sup>关于这个问题,或许还要将文氏宗族放在具体的区域社会中考察,才能得到的更好的答案,进行更高层次的讨论。

### 三、文廷式宗族与萍乡传统社会的互动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士绅和民众是三大利益

主体，士绅处于国家与民众之间，是沟通两者的桥梁，作为一种缓冲力量存在，士绅对于社会的稳定、民心的凝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士绅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士绅集团的成员”。<sup>[13]</sup>笔者按照这一士绅资格的规定，以文氏三修谱为资料来源，对文氏宗族的士绅进行了粗略的统计，将他们划分为两类，一为取得了功名、学品和学衔的士绅，一为获得了官职的士绅。<sup>[14]</sup>详细统计见表2和表3：

表2：文氏宗族取得功名、学品、学衔人数统计<sup>[15]</sup>

序号	类别	人数
1	举人	5
2	太学生	28
3	生员	25
4	贡生	4
5	武生员	6

据上表，截止族谱付梓之时，取得的各类功名、学品和学衔中，太学生人数最多达28名，生员其次25名，取得的最高功名是举人共5名，总计68人。

表3：文氏宗族获得官职的士绅人数统计<sup>[16]</sup>

序号	类别	人数	序号	类别	人数
1	知县	2	9	经历	2
2	同知	1	10	从九职	21
3	州同	4	11	军功五品	1
4	训导	1	12	军功六品	5
5	知州	1	13	军功七品	1
6	通判	1	14	军功八品	2
7	司狱	1	15	议叙八品	3
8	典史	2	16	议叙九品	4

上表中所统计的官职中最多的是低级的从九职共21名，最高官职的为同知1名，知府3名。不仅包括文职，也有武职，获得军功的共9人，以上合计为51人。这些获得官职的士绅没有获得功名，至少在族谱中没有记录。而在获得了功名的士绅中，取得的最高的官职，文职的有知府和兵备道各1名，武职为营都司1名。两类士绅共计119人，而文氏宗族列入族谱中的男丁人数总共为320人，士绅人数为总人数的37%。

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地方志“暗含着诸多权力关系和目的意图，是地方官绅竞相染指的话语权利和文化资本……县志文本尤其是像人物传记、艺文志这样的门类，是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种力量凭借各自的实力规划和描绘出来的‘权力分布地图’，是对地方权力结构

的投影及其合法化的诉求与表达”，<sup>[17]</sup>是“地方宗族彰显实力和提高声望的一个平台”。<sup>[18]</sup>因此，毫无疑问地方志中所记载登录的宗族人物、事迹和文章的多少可以反映出这一宗族参与地方社会的程度及其话语权的大小。笔者检索历修《萍乡县志》、《袁州府志》和《江西通志》，文氏宗族列入各级地方志的男性共16人次，县志11次，府志7次，省志1次，分布于人物志、善士传、忠义传和孝友传等各门类中，入选府县志的艺文有7篇。下面兹举数例列入地方志中的人物。

文嗣发，字又祥，怀信里人，康熙时职员，少孤寇浚作宛转，其计以脱母，患寇凭，偕兄受学，先后补弟子员，援例膺职，兄善病亲调汤药，月余衣不解带，兄没忧劳甚，其天性然也，岁大祲，输谷广济，竭蹶终其事。子学有传。<sup>[19]</sup>

以上材料为族谱引自同治《萍乡县志》，文嗣发为迁萍第五世，县志主要叙述的是嗣发的天性仁孝，对母兄恪守为人子为人弟的职责，“计以脱母”，“亲服汤药”，同时还乐善好施，在大灾之年，能“输谷广济”。最后还特别提示其子文学有传，其详如下：

文学，字汉昭，性诚笃，好学博通经史，任信丰训导二十余年，以礼化诸生，终日无疾言遽色，而人自服其教，居乡好施，党争颂之。<sup>[20]</sup>

此段文字为族谱抄录于《袁州府志》，文学作为信丰训导，“以礼化诸生”，从而赢得了进入府志的资格。族谱所记之文氏宗族中的士绅，最为称颂，也是官职最高的是文廷式的祖父文晟，文晟的谥号为“壮烈”，称之为壮烈公，如谱序中所述，“文氏有文翁之德以启之，有信国壮烈之节一继之，其子孙复能发名成业。”<sup>[21]</sup>其气节足以与文天祥相称，其地位也可以与文氏远祖文翁相比。文晟的事迹，不仅列于《萍乡县志》和《袁州府志》的忠义传，同时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江西通志》的忠义录，而且篇幅巨大。兹摘录于下：

文晟，字叔来，萍乡人，嘉庆乡举大挑广东知县，署连平知州，值岁饥盗起，晟单骑入乡，缚其魁发仓粟……调清远县多水患，晟筑石角围以时宣泄，田尽饶……署嘉应州知州补鹤山知县，博罗诸乡以争水，互相多杀伤，晟为勘水源……咸丰三年，擢惠州知

府，未之任四年贼陷长乐围兴宁，晟督团练迎击之，擒贼孔亚幅等三千余人……署州事矣，九年贼自福建龙岩、永定窜大埔，晟督勇御之三河瀟，贼趋间道袭州城，晟旋军议守城中粮绝地道，猝发贼众至，晟手刃十余贼，遂遇害……闻照道员议卹建专祠，赐谥壮烈。晟故侍郎刘凤语女婿……<sup>[21]</sup>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所述，“在公与私两大系统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乡绅阶层……高度集权的国家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而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这就是乡绅阶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sup>[23]</sup>士绅在传统时代地方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体现在作为萍乡强宗大族的文氏身上。族谱中关于文氏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也多有记载，如下：

乾隆乙酉、乙亥两值岁荒，以私财运湖湘米平糶邑之人，已啧啧颂义矣，先生承先志益勤不怠，如修学宫，设义田，建试棚，及赈饥、育婴，诸义举，每自割膏腴以襄事，平居济人之急如救焚。<sup>[24]</sup>

文氏宗族在修学宫，设义田，建试棚，及赈饥、育婴等诸项地方社会公共事业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咸丰年间的萍乡知县锡荣曾经撰文，“余奉摄萍之檄询诸前令尹刘仲宝太守以地方人才……吾所深信者惟子立先生，文其姓鹄其名……延先生于幕得见颜色询以地方公事”，<sup>[25]</sup>可见文氏宗族之人常为知县的座上宾，在地方事务中有发言权。族谱中转引了文氏宗族对地方社会中某项公共工程的重修，进行具体记录的材料。其详如下：

自楚王渡江而得萍实，吾邑因是而名萍乡，即斯桥之命名，亦缘此始，考《春秋》至于古迹之见于《孔子家语》者，阅数千年于兹矣，而路当孔道，为云贵川咽喉，商贾之辐辏，仕宦之车辙，往来络绎，无虚日，岂仅邑人之利涉已哉。乾隆辛卯夏，吾邑毒蛟四出，上自宣风下迄湘东，所至坍塌，民舍冲损，水田无算，而斯桥亦圯于水。邑侯飞章报大府，亲临履勘，抚恤有差，复集绅士会议谋建新桥，以利病涉，

计费在千余金有奇。文君合三乃邀予二人，独肩其任，并募亲友中有力者十余家，共相协助，于是招匠瓦石兴工于癸巳之春，如其旧之数横加广数尺有奇，共用白金近二千。事未竟，而合三遽捐馆舍，弥留之际，复谆谆命中和元始终相予。今桥落成矣，而合三暨诸君竭力以成，此举敢谓留阴德以示子孙哉。以可行者力诸已，以不可知者俟诸人，将来兴废举坠以斯桥于不朽者，不能不有望之于后之诸君子。<sup>[26]</sup>

萍实桥为萍乡的地标性建筑，桥名来源于“吾邑因是而名萍乡”之萍实，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地当孔道”。在桥圯之后，知府召集士绅开会商议重修，而文合三作为召集人出力捐钱，同时邀集族人出工，此桥终于在文氏两代的努力下得以告竣。其后屡次重修，其主持者也是文氏宗族的士绅。

作为士绅众多的文氏宗族，通过参与各类地方社会公共建筑的修建、重修，与地方社会互动频繁，贡献着自身的力量，对地方社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同时在参与的过程中，加强了与其他士绅宗族和地方政府的交流，为文氏宗族的发展壮大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四、文廷式宗族与萍乡煤矿<sup>[27]</sup>

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日益受到西方影响，社会逐渐转型，向着近代化前进，但身处内腹地区的江西，直到九江开埠之后，传统社会才悄然发生若干变化。萍乡地处湘赣边界，煤炭资源虽然丰富，但同中国其他的乡村市镇一样，萍乡在传统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直到萍乡煤矿开采的逐渐机械化，才开启萍乡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官办萍乡煤矿的建立。

文氏宗族在萍乡默默耕耘，实力不断提升，影响范围由一个县，到整个府，再到江西省，分别的代表人物为文礼国、文学、文晟，他们的事迹传记分别登录于县志、府志、省志。到了清末，文氏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诞生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文廷式。

文廷式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即认识到矿山对于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性，曾多次进谏光绪皇帝兴办矿业，“惟矿出于山，为天地自然之利，此而不取，更将何待？”，“严参疆臣迟延阻挠开矿，请特派查矿大臣，延请泰西矿师，调查全国矿情，然后明降谕旨，准民集资开办，官为保护。商力不足，酌提官款助之，减轻矿税，二十分而取一”。<sup>[28]</sup>可以说，萍乡煤炭开

采的机械化、萍乡煤矿的成立与文廷式及其宗族具有深厚的渊源。

萍乡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且煤炭质量优良，发现时代甚早，最早以土法开采，仅供民间使用，还未烧炼焦炭以供机器制造之用。十九世纪末西人赖伦勘查后认为萍煤“脉旺质佳，迥非他处可比”，“如每年采用一百万吨，可供五百年之用”。<sup>[29]</sup>

1890年诞生的汉阳铁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是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的标志。汉阳铁厂当时最大的难题是缺煤缺焦，严重到开工率不足三分之一，亏损巨大。因此，1892年张之洞派欧阳炳荣到萍乡设煤务局，采购土煤并原煤，运往汉阳铁厂，然而困难重重。<sup>[30]</sup>这时萍乡主要产煤权掌握在地方士绅手中，零散小规模分布在各个地方，比较大的商井和山主主要有安源的贾姓，紫家冲的文姓，高坑的欧阳姓，双凤冲的甘姓，天磁山的彭姓，城北太平山的许姓，胡家坊的胡姓、甘姓等，乡绅把它看成是“聚宝盆”排斥异姓，试图独占煤炭资源，如乡绅彭颐真为争夺当地煤炭资源，把当地周围山岭围起来，埋下界石，规定“禁止外姓开采”。而且，这一时期的土煤井，技术还是相当落后，即使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土井，也只是利用土镐油灯、竹筒抽水等原始工具进行简易开采。商井山主林立没有统一的协商和开采技术原始落后，使得煤炭在运往汉阳铁厂过程中掺杂过重，“萍乡办煤，奸商以贱价购下等煤掺杂，交通铁厂委员、司事含混收入，兼以少报多”，<sup>[31]</sup>致使运煤炼焦炭均未成功，汉阳铁厂的困境并未得到缓解。

这一窘境的转机出现在文廷式及其宗族的介入。1896年盛宣怀接受汉阳铁厂之后最头疼的问题依然是缺煤缺焦。而这时被参革职回乡的文廷式正好利用文氏宗族的广泰福的有利条件，会见张之洞与盛宣怀，正如盛宣怀所记，“适遇文芸阁学士过鄂面商，伊有堂弟文廷钧愿认萍乡一路，当即专责赴萍采运”，<sup>[32]</sup>建议改汉阳铁厂由煤务局驻萍采买为广福商号承办采购，并且力陈采用机器大规模开采萍乡煤炭的必要性。这年四月，即确定由广泰福商号承办铁厂所需煤焦。文廷式即与堂弟文廷钧等为此奔走，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扩充商号，在充分集资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之前分散的煤井整合以使之统一协调，为此文家兼联合的煤井至少有十八处、焦厂有七处，“各名如紫家冲、同源两厂，并同庆、同福、同源、同茂、同泰五井；王家源厂

并广泰、广生、四和三井；太平山大中坑厂并平福、森盛、鸿福、全福、德福、升福六井；善竹林厂并同德井；张公塘厂并三多井；双凤冲厂并安字、协字两井；共炼厂七处，煤井十八处”。同时，在煤炭的开采方面，文廷式欲利用机器开挖，用机器起重吸水，运煤方面用小轮船到湘潭拖带煤船。<sup>[33]</sup>为何文廷式及其宗族能扩大“广泰福”号，协调各方利益？笔者认为这与文氏宗族开办的广泰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文廷式及其宗族在萍乡的名望息息相关。

然而好景不长，文廷式个人政治处境的恶化加上各种其他因素，广泰福逐渐地衰落了。1898年3月，盛宣怀会同张之洞，奏请朝廷，采用西法，在安源兴办萍乡煤矿，最重要的就是将广泰福商号并入。虽然文廷式及其宗族的广泰福号以失败收场，然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将广泰福号看作一个过渡阶段，它很好的履行了历史赋予与它的使命。如果没有广泰福号将一盘散沙的各煤井整合，萍乡煤矿的成立将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

成立萍乡煤矿之时，“江西物产虽富，风气未开”，洋矿师来萍勘矿，就引发轩然大波，萍乡众士绅强烈抵制。他们强硬的态度与他们观念落后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这时文廷式作为萍乡首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将广泰福号并入萍乡煤矿。不仅如此，文廷式在广泰福商号归并萍乡煤矿后，被聘为萍乡煤矿“协同照料地方首绅”。这期间，文廷式也为萍乡煤矿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文廷式协调官、绅、商民的关系，“晓以有益，无碍土矿”，减少了工程中遇到的阻力，使得萍乡煤矿顺利开办、平稳过渡。从而使得，萍乡诞生了这一个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使用机器的官商办萍矿，成为中国近代化早期的最大矿，被称为“中国近代十大矿之一”，是日后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立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萍乡也因为领风气之先而闻名于世。<sup>[34]</sup>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廷式及其宗族利用自身在萍乡深厚的影响力，在萍乡各煤井“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之时，以文氏宗族的广泰福号为基础整合各方力量，采煤炼焦供应汉阳铁厂；在自己的尝试走入死胡同之时，也迅速转变观念，排除各方的阻扰，将广泰福号并入萍乡煤矿，为萍乡煤矿的成立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萍乡煤矿日常运行中，为其“保驾护航”。总之，文廷式及其宗族为萍乡煤炭开采的机械化和萍乡煤矿的成立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

### 五、余论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文氏宗族迁萍之时即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不久就建立了完善的宗族组织,具备优良的家风家学渊源深厚,这些因素使得文氏在萍乡的影响力逐步提升,成为萍乡的强宗大族。在传统社会里,文氏宗族士绅众多,这是宗族实力的体现,也是宗族实力继续壮大的基础,他们积极参与地方各项事务,在各项公益事业中不难看到文氏成员的身影。传统社会中“如鱼得水”的文氏宗族也是萍乡的近代化中的“弄潮儿”,这充分体现在文廷式及其宗族在萍乡近代化“导火线”——萍乡煤矿建立时所起到的作用。

萍乡煤矿的成立使得萍乡社会走上了近代化的快车道,从此萍乡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注释:

[1]陈增玉,《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序》,《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光绪十年。

[2]四修族谱序,“吾族自吉郡迁居萍邑遭明季变乱谱牒散失,自乾隆丁巳就先人笔记小册核诸庐陵富田老谱,修辑以来终清之世凡三修,旧序犹存可考其经过情形焉”。

[3]《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一

[4]《萍乡文氏三修族谱》载:文时,字春元,行四,成都人,汉蜀守翁之后,五代唐庄宗同光三年乙酉官帐前指使,轻车都尉,来镇江西,巡吉至永新,值袁公惟一女,遂以妻之,石晋兴,不仕,家永新北乡钱市坑东上坡,夫妇并葬本里固塘社黄土基,苍鹰啄兔形,甲山庚向,子一环。

[5]文翁(前156~前101),文氏宗族认定为远祖。名党,字仲翁,西汉官吏。安徽舒城人,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文翁在众多文氏谱牒中认定为其远祖。

[6]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三《传记》

[7]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0-21页。

[8]葛剑雄提出移民分两种类型:一为生存型,是为维持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一为发展型,是为了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而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参考《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9]《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三《达公祠规》

[10]《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三《湘东始迁祖尊三公传》。

[11]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8页。

[12]《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一《序》。

[13]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1页。

[14]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两类一般会有所重合,而为避免重复统计人数,本统计在有功名且担任官职的情况下,划分为第一类,只有在该人只担任官职没有获得功名、学术、学品的情况下,列入第二类士绅。

[15][16]来源于《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二《湘东县城二分齿次图》

[17]李晓方:《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博士学位论文,第204页。

[18]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载《史林》,2013第5期,第78-88页。

[19][20]《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三《县志人物传》

[21]《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一《序》

[22]《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四《江西通志忠义录》

[23]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1998年第3期

[24]姚莹(戊辰进士,福建和平县知县):《文融谷先生诗文集序》,《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四《记序诗赞》。

[25]锡荣:《高人文子立先生是亦谿台碑》,《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四《记序诗赞》

[26]黎崇德:《重修萍实桥记》,《萍乡文氏三修族谱》卷三《传》。

[27]萍乡煤矿,广义上泛指江西萍乡县境矿区煤田与所有私井与官商矿,狭义专指1898年受张之洞委派,由盛宣怀创建、官督商办的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及1908年改制商办后的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萍乡煤矿。本文取用狭义之萍乡煤矿。参考肖玉琼:《近代萍乡煤矿与萍乡士绅(1890-1928)》,南昌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8]文廷式:《请访刘坤一派员开采煤矿并严禁日货销售片》,转引自肖玉琼《近代萍乡煤矿与萍乡士绅(1890-1928)》,南昌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29]陈旭麓等:《汉冶萍公司·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56页。

[30]赵树贵,陈晓鸣:《江西通史一晚清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55-230页。

[31][32]陈旭麓等:《汉冶萍公司·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134页,第225页,107页。

[33][34]赵树贵,陈晓鸣:《江西通史一晚清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55-230页。

(责任校对:吴侃民)

(下转第47页)

需求,有的受改编样式的自身特点的限制,有的受影视作品改编的时代理念的影响等等,但是考虑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关注的重点和需求异样,“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改编后的影视创作应该根据小说为蓝本,在其内容(故事情节)和结构上做出了正确的取舍才能创造出优秀、感人的影视作品。

#### 参 考 文 献

- [1] 余华著.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 [2]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218.
- [3] 马知遥.余华的“现实”和《活着》的现实性[J].名作欣赏,2002(1).
- [4] 尹从.不同的活法——《活着》之小说与电影的比较[J].电影评介,2006(15).
- [5] 郑阿平.中国式的生存哲学的阐释——解读《活着》[J].唐都学刊,2007(4).
- [6] 高宇民.中国西部电影中的喜剧性元素分析[J].电影艺术,2004(2).
- [7] 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8] 黄莉莉.浅谈电视艺术和电影艺术的比较[J].教书育人,2008(4).
- [9] 秦峰.余华“活着”美国行[J].文化交流,2004(01).
- [10] 吴琼.作为话语的叙述与作为故事的叙述——从小说到电影看《红粉》的叙事策略[J].影视纵横,1995(04).
- [11] 曹文慧.论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3.
- [12] 苏丹丹.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研究[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
- [13] 陈岩.电影与电视传播的差异[J].电影文学,2009(4).

(责任校对:吴侃民)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Artistic Forms of To Live

— Novel, Movie and TV play

Guo Ying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rt forms, Yu Hua's classical novel To Live has been successively adapted for the movie named Huo Zhe and the TV play named Fu Gui. The three artistic forms (novel, movie and TV play) of To Live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detail treatment and theme concern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great differences among them from the macro aspect and states that three different artistic forms have their own innovations. The value goals pursued by these three artistic forms are different, so the emotions they convey and the points they emphasize varies. That is why the artistic forms of film and TV delete some redundant details and add some extra details.

**Key words:** Yu Hua; To Live; novel; movie; TV play

(上接第38页)

## The Prosperity of Wen Tingshi's Clan 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Pingx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Yang Shuigen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Wen's clan first moved into Pingxiang during Zhengde and Jiajing periods in M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good material base, perfect clan organization and excellent family tradition, Wen's clan became the biggest and strongest clan in Pingxiang during Qing Dynasty. It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affairs in the period of traditional society, which strongly promoted the social changes in Pingxiang.

**Key words:** Wen's clan; Wen Tingshi; Pingxiang in late Qing Dynasty; social changes